

敦煌艺术宝库,以辉煌壮丽的无数壁画、雕塑和珍贵的文书经卷著称于世。而近代献身于敦煌艺术研究和保护的人,也无疑是敦煌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宝贵财富,他们或致力于考证训诂,或沉醉于壁画临摹复制,或上下求索四处奔走投身于文物的保护,敦煌文化和敦煌学因此而发扬光大,影响远播世界——

### 敦煌文化最早的研究者

叶昌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金石家,知识渊博,国学深厚,尤长金石、版本及方志,著述甚多,学术地位和名望很高。光绪二十八年53岁的时候,叶氏被朝廷委任为甘肃省府学台,在甘肃呆了4年,教育和文化方面政

绩多多。因为叶昌炽是一个学问家,在任期间,他自然十分留意敦煌文化的研究和敦煌文物的收藏与考证。所以,从这个角度上来说,叶昌炽实际上是研究和关注敦煌文化最早的人。

1902年,叶昌炽出任甘肃学台时,正逢莫高窟藏经洞刚刚发现两年时间。他从敦煌县令汪宗瀚处得到一些藏经洞遗书。专家学者的学养和艺术评价眼光让他发现,这批敦煌遗经和绢画非常有学术和艺术价值,是很珍贵的东西。于是,他提议将藏经洞遗书运往省府兰州

保管,得到省府同意。但后来,因驮运这批文物所需五六千两白银巨额费用无以筹措,只好作罢。不幸的是,这竟导致以后大批的敦煌珍贵文物流失国外。

叶氏得到的敦煌文物,有经卷,有精美的绢画,有石刻拓片等等。经卷有《大般涅槃经》、《大般若石经》和《开益经》等。叶昌炽一一对经卷的墨色、纸张、内容、书写字体和笔法,进行了悉心的考证和研究,发现这些敦煌卷子都是珍贵的唐代写本,与当时传世的日本海船本佛

经同出一源。他把这一重要论述,写入自己的著作《语石》稿本中。

他还对得到的3幅莫高窟佛教绢画像,进行了精心的考证研究。他认为,《水陆道场图》“惟笔墨出于俗工,尚不甚古,极

早为明人之笔”。依据供养人“节度使曹延清”和“乾德六年”的题记,他断定《水月观音像》乃北宋时作品。此外,他对《于阗公主供养地藏菩萨像》,也作了详细的考证研究。

叶昌炽得到并研究过的莫高窟碑石文物拓片就更多了,譬如《莫高窟碑》、《唐李公碑》、《李太宾造像碑》、《李氏再修功德记碑》和《皇庆寺碑》等等。据他推断,这些碑文拓片,对莫高窟历史研究有重要价值,其中一块为吐蕃珍稀石碑。

## 他们的名字与敦煌同辉

林 泉

叶昌炽在陇 4 年,留下的惟一遗憾是没有能亲赴敦煌进行实地考察研究。卸任东归后,他听到斯坦因劫去敦煌文物 29 箱、伯希和劫去 1500 多卷敦煌遗书的 消息后,心情复杂沉重,懊悔自己在学台任上,没能敦促甘肃省政府把这批珍贵文物保护下来。深深的内疚之情,使他在以后对敦煌文物的生存状态格外关注。他与人合办《敦煌学通讯》,传递和交流敦煌文化信息;还在自己的《语石》和《缘督庐日记》两书中,对藏经洞文物文献最初的流失情况,做了记述,引起世人关注。

### 临摹敦煌壁画最早者

李丁陇,祖籍甘肃陇西,生于河南新蔡,青年时在上海美专从师刘海粟学艺,是学生中的佼佼者,后被刘海粟誉之为“第二‘大山人’”。他一生以长卷巨作著称于世,尤爱敦煌艺术,曾历尽艰险步行数千里去敦煌探宝,写下一段鲜有人知的传奇故事。

李丁陇是 1938 年辗转香港到北方,初冬从西安上路的。一行 3 女 10 男,队伍名之“赴敦煌探险队”(发起人李丁陇任队长),沿着唐玄奘西行取经的路线西行。到嘉峪关时,因气候恶劣,大部分人退出了。李丁陇夙愿不改:“死,我也要死在去敦煌的路上!”他和另一位家在敦煌的青年刘方,穿上临时买的皮袄和毡靴,又上路了。在塞外寒风凌厉无人迹的荒原上向西艰难行进一月有余,他们靠非凡的毅力,成功抵达敦煌。

在一个又黑又阴冷的洞子里,他铺草作床安了“家”。第二天,就披裹着破被子开始如痴如醉地临摹壁画。他每天在洞子里临画长达七八个小时,曾经冻得发高烧差点死掉。爬树上洞子,摔下来不知多少回。由于长期营养不良,晒不上太阳,又没理过一次发,李丁陇变得又瘦又小,面色污黄,须发纷乱,满身虱子,形骸狼籍不堪,活像个乞丐,当地人因此传言“庙里住了个‘野人’”。他以达摩面壁的苦行精神,坚

持临摹到次年 5 月,用了整整 8 个月的时间,完成了宏大浩繁的“极乐世界图”临摹草稿和一百多张单幅画,还有不计其数的飞天、藻井和佛手图案。

1939 年 8 月,李丁陇皮包骨头回到西安,举办了“敦煌石窟艺术展”,高 2 米、长 15 米的《极乐世界图》巨幅长卷和近百幅精美的单幅临摹画,在艺术界引起轰动。李丁陇在敦煌亲眼看到被伯希和、华尔纳等人切割盗取了精美画面的大量残墙破壁,以及莫高窟无人管理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……感到非常难过和痛心。他办展的目的是,敦促政府采取措施进行保护。1941 年初,李丁陇又到成都和重庆办了展览,并与张大千相识。受其影响,张大千产生了当年也去敦煌的打算。

在办展的同时,李丁陇多次上书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、教育部及文化委员会采取措施保护敦煌文物,但没有回应。他又给于右任、陈立夫、张道藩等国民党要员写信,仍不见反应。后与张大千谋划共同呼吁,通过国民党要员周伯敏(于右任的外甥,懂书画),劝说于右任亲赴敦煌进行了实地考察,加之中央通讯社摄影记者袁丛美与重庆《大公报》的配合呼吁,才有了结果,1943 年,国民政府成立了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”筹委会。

1944 年,李丁陇再赴敦煌,对第一次临摹的画进行了仔细的复核和编号,又临摹了一批新作。1946 年,李丁陇在兰州再次举办临摹壁画展,西北最高军事长官朱绍良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、爱国将领冯玉祥、文豪郭沫若等众多达官名流,欣然为展览题贺,邵力子等要人也在《民国日报》刊文谈保护之事,影响日大。1948 年李丁陇又应邀在南京、上海等地举办了展览,使敦煌艺术在大江南北影响远播。

促成“艺研所”建立功不可没者

国画大师张大千,对敦煌艺术也是渴慕已久。1941 年春,他带着儿子张心智、侄儿张彼



得、学生肖建初和刘力上等人，离开成都，取道兰州，乘一辆油矿运输车到达敦煌。

到莫高窟的第二天，张大千就带人清理已经坍塌和毁损的洞窟门廊，然后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进行踏勘。为了系统科学地了解和整理洞内文物，在熟悉了各洞情况的基础上，他在伯希和之后，对洞窟从南到北的顺序重新编了309个号（代号为C）。

随后，张大千在莫高窟展开了多方面的工作，调查、建档、研究和考证，同时大量临摹壁画和塑像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他和他的学生们在敦煌呆了两年时间，临摹壁画近300幅，并获得大量的图案装饰资料。这些早期临摹作品，为后人的临摹和修补复原提供了借鉴。1963年莫高窟大规模维修时，就有近200幅他的临作被借用为参考。

还是在敦煌期间，张大千就选临20余幅形象比较完整的唐代单身壁画，寄回成都举办

了《西行纪游画展》，意在宣传敦煌艺术。1943年5月他回川后，又将临摹的上乘之作结成《敦煌临摹白描画》3集出版。1944年1至3月，他再次在成都和重庆展出了44幅敦煌壁画精美临作，曾轰动一时。

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期间，还有一段遭受陷害诬冤的奇特经历。在临摹复原和考证研究中，张大千对一处破损严重的宋代画败壁进行清理中发现，下面竟是一幅更早更好的唐画，即《都督夫人出巡图》。这是敦煌重层壁画的最早发现。他们对这幅已经破损了多处的晚唐壁画进行了复原修补，不料有人“举报”到省参议会上，指诬张大千破坏文物。在长时间以讹传讹，流言广播，给张大千带来极大麻烦和伤害之后，省政府和南京政府教育部仔细进行了“查究”，终得出公正结论：“张大千在千佛洞（即莫高窟）并无毁损壁画情事。”

事实上，张大千在敦煌不仅没有破坏文

物,还清沙补墙,修理了不少破损严重的洞窟、甬道和扶梯,做了许多保护工作。在敦煌期间,他收集到不少敦煌遗物,从士兵的火堆里抢救出一批汉简……这些宝贵的敦煌文物,他都交给了新来筹建“艺研所”的常书鸿。他还把两年中辛辛苦苦所做的调查、研究和考证的全部资料也留下来,成为研究所的第一批珍贵馆藏科研资料,为后来的敦煌学研究提供了基础。

在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 1941 年 10 月视察敦煌时,张大千曾向于右任汇报了莫高窟文物的珍贵和毁损情况,并恳请于右任上提案建立机构进行管护。两个月后,于右任果然提交了正式提案,成立了“敦煌艺研所筹委会”。1944 年 1 月,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”正式设立,敦煌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开始上路。这里面,张大千功不可没。

1949 年,张大千在印度举办了敦煌临摹壁画展,首次将敦煌艺术展示给世界。后来他把从海外重金回收的一批敦煌遗书和经卷,以“半赠半卖”的形式转给了国家文物局。这批珍贵敦煌文物,在北京“特展”之后,不久就回到了她的故乡——美丽的敦煌!

### 献身于敦煌艺术 50 年者

常书鸿从青年时代寻梦敦煌,一头扎进莫高窟 50 年,为敦煌艺术的研究和保护奉献了毕生心血。因此,他被世人称为“敦煌痴人”、“敦煌的守护神”……

常书鸿 23 岁时赴法留学,先后在里昂美术专科学校和巴黎高等美术学院学习,曾师从新古典主义大师劳郎斯学习油画和美术史。在法学习 10 年间,他创作的不少油画陆续获得法国美术界的各种金奖和银奖,因之被吸收加入了里昂美术家协会和全法肖像协会。

1935 年,他在塞纳河畔书摊上看到伯希和写的《敦煌千佛洞》一书,被深深地震撼!他毅然决定:回国,去敦煌!去抢救和保护敦煌艺术!

1943 年,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行文成立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”筹委会时,常书鸿被委任为副主任委员。他告别妻儿,踏上了去敦煌的旅程。常书鸿一到莫高窟,就投入工作。张大千当时还没走,陪他参观洞窟,介绍情况,并共同商讨计划,着手建所和保护研究的工作。

张大千离开敦煌时,对常书鸿说:“我们走了,而你却要长期留下来,这是一个‘无期徒刑’啊!”张大千语重心长的这句话,忽然沉甸甸地压在常书鸿的心头,他预感到未来人生路的艰辛和责任的重大。当时张大千蒙冤,常书鸿冒着得罪权贵的风险,挺身而出,为他辩诬作证,使张大千的冤案得到昭雪。

年轻的常书鸿,从一脚踏入莫高石窟,就开始了他 50 年不间断的艺术和人生苦旅。作为“艺研所”的第一任所长,他在那里组织和带领研究所的人员呕心沥血地艰辛创业;在那里年复一年地临摹壁画;在那里带领一批又一批有志学人攻关搞研究;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又一个宣传和弘扬敦煌文化的国际性会议,使敦煌艺术的影响越来越大……

可以这样说,常书鸿是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敦煌,奉献给了敦煌学。当然,他同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:一生蜗居在荒寒的沙漠里,像一个苦行僧似地吃尽了苦头;因为痴迷“敦煌”,他遭受过妻离子散的家庭不幸;“文革”中,又饱受精神和肉体上的无情摧残和折磨……但他义无反顾,以惊人的意志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,默默地工作,苦苦地坚持,没改初衷。正如他后来的夫人李承仙所言:“先生的心里,装的只有敦煌!”先生魂系敦煌!”

著名的对话文学作家池田大作,与他进行了“敦煌文化”对话后写成一本书:《敦煌的光彩》。他说他从常书鸿身上看到了“人的真正价值”。他把常书鸿称之为中国的“人物国宝”。